

DOI:10.13438/j.cnki.jdx.2016.02.010

中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 效应分析与逻辑判断*

韩占兵

(黄淮学院 经济管理系, 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主要指新生代农业劳动力严重匮乏, 无法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正常新老更替的现象。从负向方面来看,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影响效应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对现代农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二是减弱农产品有效供给, 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三是使得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匮乏威胁; 四是对农村土地资源形成错配, 亟待制度创新; 五是冲击传统农村社会运行体系。从正向方面来看,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也同时为中国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减少农民”的历史机遇。国家应当鼓励弱质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 构建起城乡间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 培育新生代农业劳动力, 着力促进农民由兼业化向职业化过渡。

关键词: 农业劳动力; 代际转换危机; 效应; 逻辑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6)02-0074-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YJC790042);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CJJ089);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5A790019);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ZD-084); 河南省社科联、省经团联调研课题(SK1-2015-2839)

作者简介: 韩占兵, 男, 博士, 黄淮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缩减, 农业劳动力弱质化趋势凸显。在“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 大量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1]。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 同时也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又成本低廉的人力资源支持。但是, 农村青壮年人口的过度流失也造成了农业劳动力断层问题。特别是近年来, 以农民老龄化与女性化、农村人才空心化和农业生产副业化为表征的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问题日益突出^[2]。农业劳动力的新老交替和代际转换是人类新陈代谢的重

要组成部分, 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局面势必对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3]。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主要指新生代农业劳动力严重匮乏, 无法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正常新老更替的现象。农业劳动力的世代更替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得以持续进行的必要条件。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形成和蔓延, 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作为一个正在经历财富积累和经济结构变迁的后发工业化国家, 中国新生代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下降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其对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将长期并存, 同时也决定了农业转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 深入分析中

* 收稿日期: 2015-11-12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所产生的负向效应与正向效应,将有利于从正反两方面客观理性认识农业人口空心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辩证看待当前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二、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宏观效应分析

(一)负向效应

1. 现代农业发展受到严峻挑战

有别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是社会化农业和市场化农业的集成。它涵盖了农业科技现代化、农业生产物质条件现代化和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等诸多方面。现代农业是二战后发达国家农业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前进的方向和目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人(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主体,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实用技能和科学素养,适应社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的新型农民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所以,对于现代农业发展而言,在城镇化和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保留一定数量的青壮年农业劳动力,是必须而且重要的。然而,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持续恶化造成新生力量无法接续,农业生产后继无人,农业生产主体严重弱化。农村中大量留守的高龄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根本无力承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任。虽然,部分老年农民积累了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能,但是由于该群体生理机能普遍下降,精力和体力日趋衰退,其对于农业生产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学习吸收皆处于不佳状态,难以胜任现代农业对于生产主体的高水平要求。而且,该群体对于农业耕种多是依赖传统方法和经验,不适应社会化和市场化生产模式下农业生产的新方式和新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减缓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步伐。综上所述,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高素质青年人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加剧了农业生产主体的老化和弱化,使得原本具有弱质性的农业更趋边缘化,对现代农业发展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2. 减弱农产品有效供给,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是务农主体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对于保障农产品的持续生产和有效供给意义重大。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蔓延,造成农业生产主体新陈代谢出

现一定程度的中断,大量土地耕种重任由老人和妇女来承担。此种局面在短期内对农业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不十分显著,毕竟暂时的农业劳动力缺口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代替来弥补(柯炳生,2007)^[4]。所以,过去十多年间,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支持下,中国粮食生产并没有受到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显著影响,反而粮食总产量达到2013年的60194万吨,取得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一连增”。针对上述粮食生产成绩的取得,部分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粮食增产在一定程度上更多依靠的是化肥和农药,而不是劳动投入和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李国祥,2013;庄国泰,2013)^[5-6]。

然而,从长期来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减弱农产品有效供给。首先,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会发生很大改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逐渐转变到以动物性食物为主,肉、蛋、奶和高质量米面的消费数量大幅增长,农产品消费日益呈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特点。但是,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影响下,高龄化和女性化的农业生产主体无力变更农产品生产结构,其更倾向于种植劳动投入较少的稻米等作物,对劳动投入较大的谷物、饲料粮、油料作物等生产不足。其次,随着现代营养意识的建立,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吃饱穿暖”的低层次需求,对食物质量和品种有了更高要求。但是在大量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出现缺位的背景下,留守的高龄和女性劳动力接受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较弱,劳动技能难以提高,影响粮食新品种和先进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严重制约高端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在上述两大因素作用下,中国农产品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现象日益显现,造成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相互脱节,需要进口大量高质量农产品来弥补供求失衡。如表1所示,2001—2013年间,中国主要农产品净进口数量逐年增多。谷物及谷物粉2001年的净出口532万吨,至2013年则净进口1363万吨;小麦2001年净出口2.32万吨,2013年则净进口550.70万吨;大豆表现的更加明显,从2001年净进口1369万吨,快速增长到2013年净进口6317万吨,增长速度之快十分罕见。就连中国一直拥有生产优势的稻谷和大米,也从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即从2001年的净出口159万吨,演变成了2013年净进口179.26万吨;而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全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产的情况下,中国2012年全

年则进口粮食超过了 7 000 万吨,是历史上粮食进口量最多的一年。如果全部加以核算,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总体水平已经不足 90%,远低于 95%的政策红线,国家粮食安全已经受到严重威胁(陈锡文,2012)^[7]。

表 1 2001—2013 年中国主要农产品
净进口数量(单位:万吨)

年份	谷物及谷物粉	小麦	稻谷和米	大豆
2001	-532.00	-2.32	-159.00	1 369.00
2002	-1 197.00	-34.66	-175.00	1 103.00
2003	-1 986.00	-207.57	-236.00	2 047.00
2004	501.00	617.21	-15.00	1 990.00
2005	-387.00	293.54	-17.00	2 619.00
2006	-247.00	-89.94	-51.00	2 786.00
2007	-831.00	-276.72	-85.00	3 036.00
2008	-27.00	-26.67	-64.03	3 697.00
2009	183.00	65.50	-43.00	4 220.00
2010	451.00	110.48	-23.18	5 464.00
2011	429.00	117.41	8.21	5 243.00
2012	1 302.00	363.12	208.94	5 806.00
2013	1 363.00	550.70	179.26	6 317.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海关总署数据整理测算而得。

3. 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匮乏威胁

面对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并要求培养和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然而,农村人口在城镇化浪潮下,处于急剧快速的动态演变之中,任何主观力量都无法强制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坚守农村等待培养。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大量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难堪重任,新农村建设正面临着主体匮乏的威胁。翟振武,段成荣等(2006)调查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逆向选择严重,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仅有 0.5% 的留农人口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而在外出务工人口中这一比例高达 4.8%。另外,仅有 5.6% 的留农人口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同样在流动人口中这一比例高达 23.6%。诸多学者较为关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林毅夫,2006,韩俊,2006),但却忽视了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现实。在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动加剧的趋势下,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和中坚支撑如何依靠?哪些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选择在农村建设家乡?这是未来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因为任何三农政策,如果脱离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现实状况,忽视农

业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迁移的历史背景,其效果必将不如人意。

4. 农村土地资源形成错配,亟待制度创新

学术界较早关注到城镇化和农业人口迁移过程中村落空心化问题(王成新,2005;刘彦随,刘玉,2009;崔卫国、李裕瑞,2011)^[8-9],并从空间重构、土地整治和规划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对策措施。但上述研究成果却忽视了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和农业劳动力迁移对中国现有土地制度与土地资源配置提出的严重挑战。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农村居民家庭土地经营情况来观察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变迁。如表 2 所示,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均出现了小幅上升。耕地面积由 2001 年的 1.99 亩/人增加到 2013 年的 2.38 亩/人;山地面积由 2001 年的 0.28 亩/人增加到 2013 年的 0.49 亩/人;家庭园地面积由 2001 年的 0.06 亩/人增加到 2013 年的 0.12 亩/人。在可预期的未来,随着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加剧,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将会使得人均经营土地面积进一步上升。然而,上述人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仅仅是理论测算结果,实际上大量本应该流转进而提高耕种规模的土地,一部分被留守的老人、妇女艰难支撑,一部分形成了候鸟式生产模式下无人管理、土地撂荒等“懒人农业”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土地耕种效率的提高,此即为农村土地资源错配。

表 2 2001—2013 年中国农村居民
家庭土地经营情况(单位:亩/人)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面积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山地面积	农村居民家庭园地面积
2001	1.99	0.28	0.06
2002	2.00	0.28	0.07
2003	1.96	0.19	0.07
2004	2.00	0.21	0.07
2005	2.08	0.32	0.08
2006	2.11	0.31	0.10
2007	2.16	0.32	0.10
2008	2.18	0.33	0.10
2009	2.26	0.34	0.10
2010	2.28	0.35	0.11
2011	2.30	0.49	0.11
2012	2.34	0.48	0.10
2013	2.38	0.49	0.1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注: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和休闲地(含轮歇地、轮作地)。

客观上而言,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所引起

的农村土地资源错配是现阶段农村人地关系最显著的矛盾。它表明中国农业经济在从传统小农耕种模式向现代化、市场化、规模化经营模式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土地资源亟须盘活存量、优化配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形成了以集体所有、土地均分、联产承包为基本特征的土地经营制度。此种细碎化的农地耕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中国小农式深耕细作的农业传统,同时也适应了农村社会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国在短时间内解决温饱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加剧,此种土地经营制度越来越不适应中国走向现代化、规模化和市场化农业经营的趋势。在新形势下,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女性化迫切需要以技术和资本的投入替代来提高农业种植收益,现有以土地细碎化为特征的小农式耕种模式亟待打破。因此,当前的农地制度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以改变农村土地资源形错配的局面,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事实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 14、15 世纪同样经历了农业人口大幅下降的历史阶段,这些国家适时通过产权变迁和制度完善调整了人口与土地资源比例,顺利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1999)。

5. 冲击传统农村社会运行体系

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发生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大量处于弱势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滞留农村,对传统的农村社会运行体系造成了较大冲击。首先,传统农村养老体系遭遇到了现实挑战。在“养儿防老”、“百善孝为先”等文化传统主导下,中国农村社会一直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模式。家庭养老作为一种代际之间反馈模式,是维系农村社会体系运行的重要基础和纽带。然而,随着青壮年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迁移,大量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留守老

人普遍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遭遇空前的弱化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自我养老模式正逐渐成为很多农村老人的无奈选择(朱劲松,2009)^[10]。如表 3 所示,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差异巨大,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依靠自身劳动收入的平均比例高达 37.9%,而城市老人仅为 13.0%。对农村老人而言,养老金收入占比仅为 4.6%,远远低于城市老人的 45.4%。这说明,大量本应颐养天年的农村老人依然在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以维持自身晚年生计。笔者在江苏、河南、陕西广大农村调研时发现,许多农村老年人不但要进行土地耕种,而且还要照顾小孩,为外出打工子女分担压力,生活状况堪忧。固然,一些务工收入较高的青年人可以有能力接济耄耋之年的父母,但是此种情况毕竟是少数。事实上,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还要面对城市中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经济能力十分有限。更为严重的是,没有子女日常照顾的农村老年人在未来失去劳动能力后又将如何面对“老无所依”的局面?而且这些农村老年人普遍缺乏亲情慰藉。极易在晚景凄凉的氛围中丧失生活信心。刘燕舞(2014)通过调研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 11 个省份的 40 多个村庄发现,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空心化背景下代际剥削的加强。农村老年人一生辛劳,给孩子盖新房、娶媳妇、看孙辈,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却无法得到应有的代际反馈(贺雪峰,2014)^[11]。此外,在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背景下,还存在严重的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问题。在农村现实生活中,大量农村留守妇女承担着支撑家庭的困苦和责任,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和缺乏安全感是该群体普遍的生存状态。另外,因城镇化背景下人口迁移所引发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表 3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单位:%)

类别	农村			城市		
	男性	女性	平均	男性	女性	平均
劳动收入	48.5	27.5	37.9	18.4	7.9	13.0
养老金收入	8.1	1.3	4.6	56.9	34.6	45.4
低保收入	1.8	0.9	1.3	1.8	2.9	2.4
保险和补助	0.2	0.0	0.1	0.3	0.2	0.3
财产性收入	0.2	0.1	0.2	0.5	0.5	0.5
家庭支持	39.3	68.5	54.1	20.7	52.3	37.0
其他	2.0	1.7	1.8	1.4	1.6	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

(二) 正向效应

辩证来看,事物的存在普遍具有两面性,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同样具有正负影响的复杂性。它不仅从负面影响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新农村建设,造成农村土地资源错配,冲击传统农村社会运行体系,而且还从正向积极方面,为我国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减少农民”的历史机遇。从共性规律出发,学术界较早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减少农民的观点(陈锡文,2010;郑新立,2013)。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即意味着大量新生代青壮年农民脱离农村,迁移到城市。在此过程中,农村人口会持续大幅减少,而这一历史机遇这正是众多学者所期盼的理想结果。在土地资源总量不变的硬约束下,农业人口的大幅降低会导致人均经营耕地的增加,为提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推进农业机械化步伐,增强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能力,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事实上,众多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表明,农业人口的减少是农业组织化程度和收益率提高的前提条件。比如,英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1800年为35%,1901年下降到9%,1980年持续降低至2.6%;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在1840年为68%,1980年持续下降至3.5%;日本在1872年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85%,1980年下降为11.2%。这些国家都很好的利用了农业人口大幅下降所来的历史机遇,大踏步的完成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历史任务,进而显著提高了农业收益率,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三、基于效应分析的逻辑判断

(一)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是一个重大的农业国情变化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是世界上很多经济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国家依据本国国情,各自选择了诸多有效的应对策略,较好的应对了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并成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出现,同样正是中国改革旧有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促进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良机。中国必须抓住农业人口大幅减少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

情特点,探寻出一条破解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科学路径。

(二) 应当鼓励弱质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

现阶段,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在中国农村蔓延,所导致的一个严峻现实是大量的老人、妇女等弱质农业生产主体在承担着土地耕种的任务。蔡昉(2007)研究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中40岁以上的占50%,而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就业比例竟然高达85.5%^[12]。而且,朱启臻(2011)在山东省荣成市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农业劳动力中,男性占39.5%,女性占到60.5%,远远高于男性^[13]。这说明,中国当前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妇女和老人来耕种,这是农业副业化和懒人农业的典型表现,直接制约了农业收益率的提高。农业的低收益率造成了撂荒弃田现象逐年增多。据国土资源部2011年的调查数据披露,我国每年有近3000万亩耕地处于撂荒状态^[14]。特别是在南方山区,许多地方出现了耕地抛荒现象,“双季稻”已经很难见到,此种情况如果恶化下去,必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事实上,无论传统农业生产对体力劳动的高要求,还是现代农业生产对技术知识的高要求,高龄化的老人和弱势化的妇女均无法满足。因此,这类群体根本无法承担起农业现代化大生产的重任。基于此,政府必须担当起主要责任,以政策引导和利益激励的方式,鼓励和支持老年农民、妇女等弱质农业生产主体放弃农业生产,这既是推动农业生产主体“更新换代”的重要环节,也是为顺利推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创造重要的基础条件。

(三) 破解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关键是在城乡之间构建起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结果,总体表现为农村青壮年优质劳动力向城市二、三产业的流动。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劳动力资源正在从过剩走向紧缺,在此情况下,城乡劳动力收益差距会继续扩大,上述趋势的劳动力单向流动势必会持续进行。所以,在当前城市与农村关于争夺和吸收青壮年劳动力的博弈中,农村依然处于弱势地位。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取决于农业自身发展的承受能力,劳动力的超额流动将会弱化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基础。因此,如何协调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城乡之间构建起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既能满足城市二、三产业劳动力用工需求,又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农业劳动力后继者匮乏的局面,将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四)进行新生代劳动力务农行为培育是当务之急

从年龄层次上来讲,新生代农业劳动力是相对于壮年和老年农业劳动力而言的青年劳动群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新生代农业劳动力是中国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和接班人,同时也是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力量。然而,作为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群体,新生代劳动力土地感情淡薄,普遍对农业生产一无能力、二无兴趣。当然,这有利于土地流转,农业经营规模化实现^[15],但这也为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产生和发展设置了障碍。新生代农业劳动力是经济理性人,在务农决策上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当前,亟待构建起有效的动力激励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能够吸引新生代农业劳动力和城市优秀人才在农村干事创业,打破当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局面。借鉴国外农业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笔者建议政府应实施“新生代农业继承人培养工程”和“新务农人员援助工程”,通过上述工程,为农业“新入职者”提供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土地流转、风险规避、信息共享、法律保障等多方面的扶持。相关涉农部门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新务农人员提供贯穿农业经营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业态、系统化服务。尽快培育其成为现代农业经营的新生力量,成为职业化农民的雏形和初样。

四、结语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生产主体世代更替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涉及中国农村改革深化、农业经济转型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逻辑问题。总体上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是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它意味着中国农业发展迎来了一个由小农经济模式向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农业模式转折的重要过渡时期。它既带来了诸多挑战,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为了从战略上加以应对,需要将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置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和判断,从根本上推进农业经济转型发展,这是中国实现农业新跨越的必然要求。

从短期和长期视角来看,破解中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可选路径有以下六种:第一,通过提高农业收益率,吸引外流的农村青壮年人口回流到农业生产领域。根据上文分析,在城乡劳动力收益差距持续扩大的当今,此种途径短期内很难实现。第二,通过农户兼业化,有效处理“进城收益高”和“务农收益低”之间的矛盾,缓解留守农业和老人农业的问题。此种途径较为可行,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有效的提升农业后备人力资源。通过此种形式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第三,通过调整一胎化的人口政策,来增加农村新生代人口,进而弥补农业劳动力短缺。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对人口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但此种途径的短期效应仍有待观察。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急剧变革过程中,人们基于生活成本与生活幸福指数的考虑,其生育意愿正在发生改变。第四,长期来看,破解中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根本选择是农民职业化,并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事实上,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正是通过农民的职业化,有力的推动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的浪潮,进而实现了农业整体现代化。但鉴于中国复杂国情,此种路径还需进一步探讨。第五,实现农业生产主体由弱到强的转变,即推动农业生产主体进行“增减转换”。一方面,鼓励老人、妇女等弱质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领域,减少土地耕种的“留守力量”;另一方面,要着力培育新生代农业接班人,使其成为中国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和承担者,同时也是农业现代化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力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进行新生代农业接班人培育就是要直接解决未来“谁来种地”这个问题,这是应对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最紧迫任务。第六,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水平。围绕中国农业政策体系的局部深层次问题,进行制度优化和调整,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性变革和历史性跨越。

参考文献:

- [1] 汪增洋,费金金.人口迁移的空间抉择:本地城镇化抑或异地城镇化[J].财贸研究,2014(6).
- [2] 周祝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人口研究,2008(2).
- [3] 韩占兵.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分析框架、现实判断与破解之道[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 [4] 柯炳生.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发展现代农业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7(9).

- [5] 李国祥,杨正周.美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及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3(5).
- [6] 庄国泰,沈海滨.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J].世界环境,2013(4).
- [7] 陈锡文.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几个主要问题[J].改革,2012(10).
- [8] 刘彦随,刘玉,等.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实践[J].地理学报,2009(10).
- [9] 崔卫国,李裕瑞.中国重点农区农村空心化的特征、机制与调控[J].资源科学,2011(11).
- [10] 朱劲松.试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自我养老模式选择[J].农村经济,2009(8).
- [11] 贺雪峰.改革语境下的农业、农村与农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3).
- [12] 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 [13] 朱启臻,杨汇泉.谁在种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 [14] 田祚雄.农村土地抛荒需警惕[J].中国乡村发现,2013(2).
- [15] 赵保海.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问题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责任编辑:彭介忠)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Crisis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Effect Analysis and Logical Judgment

HAN Zhanbi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463000, Henan China)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crisis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mainly refers to the lack of new gene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who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rom the negative aspect,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crisis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Firstly, it is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econdly, it reduces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reatens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irdly, it threatens the main body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Fourthly, it incorrectly configures the formation of rural land resources and therefore needs the urgent system innovation; Fifthly, it attacks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On the positive sid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crisis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lso provides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realize the sca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The country should encourage weak agriculture labor to quit agriculture production, build urban and rural labor flow mechanism in both directions, cultivate new generations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promote the transition from by-business to professionalizatio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crisis; effect; logic